



洪水中散步

10月10日，在余姚市区一条街道上，人们在洪水中“散步”。记者从浙江省余姚市抗洪救灾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余姚城区积水区域普遍下降50厘米左右，但部分地区积水依旧较深，城区积水全部退去要到10月12日前后。尽管四天“大水围城”没有导致人员伤亡，但给余姚造成的经济损失初步估计超过200亿元。

浙江省民政厅10日下午通报，余姚全市目前食品和饮用水供应充足，除政府采购的食品外，社会各界的捐赠食品和其他物资正在不断运往灾区。事关百姓基本生活的水、电、路灯等公共服务也正在逐步恢复。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摄

食品安全监管升级能否打造安全餐桌

民生视角看热点

本报记者 白雪

恒天然乳制品的细菌污染事件给中国人出了道考题：猜猜这次哪个部门站出来？

以前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每每“出事”，总是会沸沸扬扬地闹上一段日子，直到某一个部门站出来——有时是质检部门，有时是卫生部门，此外工商、农业部门也多少有过表态——只是谁也不确定，哪个部门负全责。

而今，人们的目光更集中地看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食药总局”）。

这个今年3月新组建的部门，注定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成长，其一

举动都让人好奇：散落在各个部门的监管职能“融为一体”，能否实现无缝监管？食品安全推行“大部制”，加上机构升格，到底带来哪些变化？最重要的是，新组建的“大食局”担负哪些监管责任，能否从此带来中国食品安全的“大时局”？

从“香饽饽”到“烫手山芋”

评判一个刚组建的部门还有些早，但新情况已经在发生。

8月2日，恒天然集团向新西兰政府上报其生产的浓缩乳清蛋白粉被检测出肉毒杆菌，8月3日，新西兰政府方面通报情况时指出“部分原料销往中国”。国内对这次事件的大规模追问由此开始，至今仍未结束。

这一回，食药总局没让观众们久等，行动速度可以按小时来计算。

就在8月4日中午，食药总局已经公布了当天早上约谈3家企业相关负责人的情况，“若企业对问题食品召回不及时、召回不报告，食药总局将采取严厉的监管惩处措施，直至该企业产品停止在华生产销售。”

透过约谈的“迅速”、“严厉”，多少能看见“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意味——这正是过去十多年间，人们所期待的。

“本轮改革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将分段监管变为分事项监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长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在他看来，国内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推动着相关制度的演进。

上世纪80年代起，由卫生部门来管理食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仅监管食品卫生已无法切合现实。后来农业部门、发改委、商务部门从行业管理的角度监管，质检、工商、卫生等部门从执法角度监管。2004年，国务院以发文的形式，把“分段监管”写了进去。

多个部门如何监管同一领域？在研究者看来，这种监管或可称为“发证式监管”。发证的权力可以带来寻租的空间，让一些部门把持着食品安全监管职责，不愿放手。华南一位学者调研发现，一个县级的蛋糕协会不得不通过投诉信的方式，向市政府反映两个部门争夺抽检费。

分段、多头监管的模式弊病，在2003年阜阳奶粉事件后已为人所察。当时国务院赴阜阳专项调查组曾指出，这一事件暴露了当地执法部门“执法不敏感，相互之间配合有差距”。这在之后被归纳为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七八个部门管不住一头猪”、“十几个大盖帽管不住一篮菜”。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以此为拐点，瘦肉精、地沟油、皮革奶等一系列事件中，这一体制均饱受诟病；随着食品安全的追责机制愈发严厉，基层执法者普遍感觉责任大，风险高。

如果说原来多头监管的格局源自于众人争抢权力“香饽饽”，后来，这个责任已逐渐变成“烫手山芋”。于是推诿扯皮成了地方上各部门在一起开会的常态。

比如毒豆芽。质监部门认为豆芽菜是初级农产品，归农业部门管，农业部门表示，豆芽菜是初级农产品的加工品，不归自己管。（下转2版）

本报成县10月10日电（记者张鹏）10月9日，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来到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调研农村基层团组织建设情况。他强调，要以服务青年为本，推进服务型团组织建设，切实为党做好新形势下青年群众工作。

农村共青团工作是共青团组织建设和工作有效覆盖的基础环节。在成县县子商务协会，秦宜智与基层青年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协会团支部发挥作用的情况，对大家运用互联网带领农村青年和农户增收致富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大家要不畏困难、不怕吃苦，把事业持续做强。他指出，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正在改变着农村的面貌，改变着农村青年的面貌。农村基层团组织要把握好“党建带团建”这一总原则，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带领青年致富、促进乡村和谐、组织活动、发挥作用。要主动联系青年、服务青年，加强与青年交流的机制化建设，在工作中要“亮旗帜”、“出声音”、“有身影”，让基层青年在遇到困难时“想得开”、“找得到”、“靠得住”。

秦宜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也是广大团员青年理想的旗帜。基层团组织在青年身边，与青年相伴，理想的旗帜要扬得起，服务青年要有实招，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青年、凝聚青年，来影响青年、引导青年，帮助青年在实践中理解和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理想信念，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在成县抛沙镇东罗村，秦宜智认真听取了大学生村官团支部的工作汇报。秦宜智指出，大学生村官是活跃在基层一线、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的一支重要青春队伍，既是基层团组织的服务对象，更是基层团组织的依靠力量。要通过有效的工作，把大学生村官凝聚到团旗下，帮助他们增进情感交流、融入当地生活，支持他们发挥聪明才干、服务当地发展。

秦宜智强调，大规模培训团干部，大幅度提高团干部素质，关系团的事业长远发展，是全团的一项战略性、全局性、基础性任务。（下转2版）

秦宜智在甘肃调研农村共青团工作时强调

以服务青年为本 建设基层服务型团组织



第八十八期“我的中国梦——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励志教育访谈在中青在线举行

自强不息成就青春梦想

本报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黄丹羽）今天，第八十八期“我的中国梦——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励志教育访谈在中青在线举行。两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大学生吴书强和中山大

学药学院学生郭艳琼来到演播厅，讲述了他们的奋斗故事。

读初一时，吴书强就曾救起过落水的小伙伴。去年寒假，他又从刺骨的冰水中救出5名落水者，而就在这次救人前一周，他的父亲刚刚因

见义勇为牺牲。“我当时没有考虑太多，如果考虑太多，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救人机会。”吴书强说，“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父母一直告诉我，要尽自己力量去帮助更多人。”生活中，吴书强始终将“奉献

比索取快乐得多”这句话当做信条。不论大事小事，只要周围人遇到困难，吴书强都会尽力相助。“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帮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父亲的离世让吴书强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母亲身体不好，收玉米、打谷子这些农活都要吴书强来做。在学校里，他还做兼职赚钱。最多的时候，他一个学期做了6份兼职。（下转2版）

父亲走了11年了。今年10月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

作为他最小的儿子，站在他的墓前，对着他的雕像，我想说些什么呢？我能说些什么呢？他老人家走过的这百年，是中国扭转乾坤、翻覆天地的百年。这百年的中国历史太丰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太丰富了，我看不尽，听不够，也享用不完。我只能在思念中寻找，寻找他老人家在我一生中留下最深烙印的东西。

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说：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还不止一次写给孩子们：“雪中送炭惟吾愿。”“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的，他都挺身而出。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人所共知，在党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帮了人。在那些家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的所谓“问题”，能搬过来的就坚决搬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责任，也绝不牵连他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许多人听了这话落泪。“没整过人”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孔融让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父亲从小对我——他这个小儿子的特别家训。父亲不止一次拿着课本，给我念这一课，拉住我的手，给我讲这一课。谦让，是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人生课程之一。在家，谦让父母，谦让兄弟姐妹；在外，谦让长辈，谦让同事；谦让荣誉，谦让利益，谦让值得谦让的一切。谦让，既意味着自己对个人荣誉、利益、所得的放弃，也意味着自我人格的升华。我感谢父亲，走入社会以后，我终于明白，父亲让我从小养成的谦让习惯，在面临复杂社会关系、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利益时，获益良多。不仅使复杂关系、棘手难题的处理容易获得公平、公正的结果，同时容易赢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普遍尊重。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13岁上初中时，父亲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进了国民党陕西省监狱。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批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

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们一家人利用春节辛苦万苦进京，打听到罗瑞卿伯伯的孩子们通过给总理写信的方式与伯伯重逢相见，全家人才重新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说：我们也给周总理写信。给总理的信发出时间不长，国务院机关事务局来人，其中两位还是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候的老人。来人传达总理的批示说：你们的父亲还健在，不久会安排与家人见面。我们既兴奋又激动，相约见到父亲时，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

1962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在我心里，父亲早已是一个遥远的、可思而不可见的梦。梦里的父亲一头乌发、身材伟岸，既威严又慈祥，可当他一旦走近，我却失去抱住他时，他却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还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见父亲的前夜，竟一夜无眠，浮想联翩：父亲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亲见我的第一句话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复猜测……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有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7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真是彻底颠覆了诗人的语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亲依然健在。与父亲团聚，长相厮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奋的是：虽然岁月无情，但父亲依然是一派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们放心了。

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199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习仲勋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

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一日

两次的斗室转圈，先逐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逐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毒攻毒”。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父亲在逆境中磨炼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进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齿渐长，阅世日深，我对父亲蒙冤人生中锲而不舍的身心砥砺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奋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这样无私的精神世界里，个人荣辱得失毫无位置。无私方能无畏，父亲蒙冤生涯中的无畏，正是源自他的无私。

父亲一生，参与完成了党的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抗日的出发地；而经济特区的创

建“杀出一条血路”，对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参与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父亲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没有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这两大使命的完成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我亲历其时其事，有一点集体记忆中的个人补充。改革开放至今35年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老经济特区日新月异，带动浦东、前海、横琴、南沙、上海自贸区等一批新的经济特区成批崛起。父亲要是还在，看到他在中央支持下亲身参与决策、参与实施的特区建设事业发展得这么快，他该多么欣慰啊！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你父亲甫一复出，临危受命，主政广东，《光明日报》第一天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媒体第二天就全文转载，并在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久，又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放权，要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他的政治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我总是从无疑地回答说：“无私无畏！”

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政治禁区比比皆是，冲破禁区的政治勇气首先来自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要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实实在在“杀出一条血路来”，没有无视安危、不怕犯错、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的无私无畏精神，就不敢大胆冲破禁锢思想的政治教条，也无法提出任何新观念、新政策、新办法，去面对和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如我父亲者，当时有一大批老同志，由于无私无畏，变得有识有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复出国后的历史贡献。

1978年，我已考入洛阳外国语学校。因为是部队院校，管理甚严，暑假只有7天假期，我匆匆去广东探望父亲。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给我出了题目，要我陪妈妈到深圳去，一路多看，了解第一手资料，要大胆谈看法——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里干活儿的几乎都是妇女，当家男人多数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浑身湿漉漉的偷渡者，被铐着，武警牵狗押送着，因为当时偷渡是“敌我矛盾”。我看到深港两地的白昼：深圳这边，沉寂渔村，香港那边，繁华闹市；而两地的夜景，深圳这边，渔火昏暗，香港那边，灯光辉煌。强烈的反差，让我有了强烈的诉说冲动，父亲鼓励年轻大学生说看法，我是“匹夫有责”。

我回到父亲身边时，带去了所见所闻。我说，明摆着，这边贫穷，那边富裕，谁不向往美好生活呢？这边姓“社”，那边姓“资”，老一辈革命一生，要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还不如500多万人的香港呢！这类议论，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私下话题。父亲听着，记着，沉思着。（下转2版）